

強盜邏輯與模糊邏輯: 由擅自摘菜說到政治鬥爭

•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從大媽邏輯到主觀正義

在YouTube頻道上有不少關於中國大媽採用奇特 邏輯去為自己霸道行為辯護的影片,其中一段視頻 顯示:一名大媽在人家的菜田上擅自摘取蔬菜,農 田主人上前跟她交涉,她不但毫無愧色,而且理直 氣壯地反駁:我需要吃新鮮蔬菜!農田主人說這些 蔬菜不是大媽種的,大媽高聲喊道:「蔬菜是由田 地出來的,我要摘就可以摘。」在另一個視頻中, 一名大媽購買了高鐵的無座票,卻霸佔了人家的座 位。那名乘客找票務員去跟她理論,那名大媽承認 自己買的是無座票,所以坐在哪裏也是一樣,她堅 決不讓座,反而指責所有人不懂得敬老,沒有素質

以上都是典型的「強盜邏輯」,當事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維去辦事,只要自己認為合理,那就是絕對合理。其他人干預、反駁都是無理的。其實,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荒謬絕倫,那麼,我為什麼仍要花時間寫這篇文章,去分析這種不值一哂的所謂「邏輯」呢?我並不是要針對那些大媽,我只是用來做引子。我真正想要提出的是:不幸地,如今知識分子圈子、傳播媒介、國際政治舞台都充斥着這種奇怪的邏輯。不過,基於一些限制,請恕我在以下分析中只能夠轉彎抹角。

舉例說,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希巴圖拉·阿洪扎達(Hibatullah Akhundzada)曾經在國家電視台播出的一段如下的音頻講話:「你們說我們用石頭砸死婦女是侵犯女權,但我們很快就會對通姦行為實施懲罰……我們認為自己捍衛人權,我們是神的代表,而你們是魔鬼的代表。」塔拉班抱着這種立場是不足為奇的,但在國際上亦有人發出類似的回響:站在塔拉班的角度,他們的做法是正義的。西方人無非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其他文化身上,沒有考慮到價值是相對的,而不是普世性的。

其實,塔利班的主張並不是出於道德多樣性或者文化相對主義,而是根植於一種極端 排他的意識形態,其特徵是剝奪女性、異見者和非信徒的基本生存尊嚴。當他們聲稱自己 「代表神的正義」和反對者「代表魔鬼」時,我們更應該警惕:任何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 政權,往往也自認有絕對懲罰他人的權力。同情或者支持這種邏輯的人有否想過,當這些 絕對主義者、極端主義者擁有壓倒性的權力時,你可能就是他們所說的「魔鬼」,他們可 以對你為所欲為!

當民族主義變成工具

亦有人套用同樣的邏輯,去為其他專制政體辯護,指出在某些文化中,基於特殊的歷 史因素和國情,發展經濟與維護民族尊嚴成為當務之急,故此需要採用高度集權方法去實 施有效率的管治。根據他們的邏輯思維,這是唯一的途徑。

問題是:即使根據他們自身的邏輯,有些說法、做法顯然地自相矛盾。結果便出現了改變定義、改變遊戲規則、改變歷史的怪現象。民族主義是一種強調民族認同、文化傳統與共同歷史的政治思想或態度,當中包含了維護領土完整與民族尊嚴。在五代十國期間,後唐節道使石敬瑭為了在中原爭奪霸權,便向北方異族契丹尋求軍事援助,他稱契丹為「父皇」,表示願為「兒皇帝」。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(今北京、天津及河北、山西一帶)給契丹作為報答,燕雲十六州是中原北方的天然屏障,一旦失守,整個北方便門戶洞開,中原政權從此失去了長城以北的防線,造成後來北宋對遼、金等政權處於長期被動狀態。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,石敬瑭完全是把民族利益擺在個人權位之下,明顯是賣國求榮。然而,在「模糊邏輯」底下,石敬瑭是完全可以被美白為「民族主義」者!

在這種語境下,民族主義不再是理念上的堅持,而是工具性的資產。人們不禁要問: 究竟是誰在定義這個文化、這個群體的邏輯?又為何相同的原則,會在不同事件中呈現出

如此不同的標準呢?或許,一個健康的政治文化應該容得下人民對歷史邏輯的追問與反思,而非僅僅要求民眾「用對方的邏輯來理解對方的選擇」,卻禁止人們以同樣邏輯質疑其內在矛盾。

倒退到叢林法則與自然狀態

其實,每個人、每個群體都有自以為正確的「邏輯」 ,這是一種「人不為己、天誅地滅」的自然狀態。霍布斯 在他的名著《利維坦》(Leviathan, 1651)中指出:沒有 法律和社會秩序,人類便會生活在「自然狀態」(state of



nature)中。所謂自然狀態,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利益做任何事,沒有限制、沒有均衡,結果「人人與人為敵」(war of all against all)。為了避免這種野蠻狀態,人們會選擇簽訂社會契約。現在,這種人人都可以根據自身邏輯而做事的態度,是一種文明的倒退。這種邏輯,其實與那位在田裡摘菜、在高鐵上霸佔座位的兩位大媽如出一轍:只要我自己覺得有道理,那就是絕對有道理。

可悲的是,大媽的邏輯不只出現在街頭爭執中,也在一些極端主義的思維裡發酵、擴大。他們聲稱自己代表神明、民族、人民、歷史,因而其所有行為都具有正義性與合法性。當外界質疑其做法時,他們反過來指控他人是「魔鬼的代表」、是對「人民的敵人」。這情況不但出現在專制政權裏面,甚至也發生在民主社會中間。例如MAGA派的人描述反對特朗普的陣營是「魔鬼」,特朗普亦曾經形容批評他的傳媒是「國家的敵人」。

這種思維方式最大的問題在於,它徹底封鎖了對話與協商的可能性。因為在這樣的語境裡,所謂的「道理」不再是基於共同價值、邏輯或事實,而是取決於話語權。是非對錯不再靠理據判斷,而是變成了「誰大誰惡誰正確」的權力遊戲。這等同於把社會運作的基礎,從法律與理性,轉向了原始而野蠻的叢林法則、自然狀態。

當「我有需要」變成「我有權奪取」,當「我相信的是真理」變成「我可以懲罰你」,那麼所有的價值標準都將崩潰。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夠建立在制度與共識之上,是因為我們願意接受辯論與制衡;一旦人人都以「自認為有理」作為行動依據,當每個人都自封為真理的化身,這個世界將不再有真理;價值若無需經得起質疑,那麼正義終將只剩下語音響亮的那一方。

因此,無論是爭菜、爭座位,還是國內政治、國際舞台上的爭權奪利,當它們以相同的邏輯運作時,我們就必須看清楚:這不是文化差異,也不是價值多元,而是文明與價值的崩壞,是一場對理性與邏輯的挑戰,是沒有邏輯的邏輯。只有正視並反駁這種「誰大誰惡誰正確」的所謂邏輯,我們才能真正避免滑入原始叢林裏面。

2025年7月25日

〈強盜邏輯與模糊邏輯:由擅自摘菜說到政治鬥爭〉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更多資訊